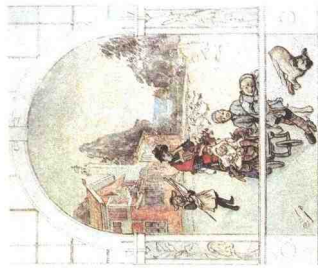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们一家子 我们的房子 和农场

WOMENYIJIA
WOMENDEFANGZI
HENONGCHANG

【瑞典】卡尔·拉松 画并文
应红 李辉 译





我们一家、我们的房子和农场

【瑞典】卡尔·拉松 画并文
应红 李辉 译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书名 我们一家、我们的房子和农场

作者 [瑞典] 卡尔·拉松

译者 应红 李健

出版发行 山东美术出版社

(地址: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人街39号 邮编: 250001)

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·德州

(地址: 德州新华路155号 邮编: 253006)

版次 2001年9月第2版

印次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

规格 16开(880×1230毫米)

6.5印张 25千字

ISBN 7-80603-241-1/Z·33

定价 12.00元

永远的安适与温馨 (中文版序)

李 辉

1992年去瑞典访问时，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国家美术馆正好在举办瑞典画家卡尔·拉松（Carl Larsson 1853-1919）的画展。我前去参观时，看到不少男女老少兴致勃勃地在门口排起了长队。后来，又发现一些邮票、挂历和贺年卡，也选用了拉松的画。卡尔·拉松被誉为现代瑞典绘画之父，活跃于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，虽然将近一百年过去，瑞典人对他的兴趣和喜爱依然如故，可见他在人们心中的重要位置。

卡尔·拉松的画从总体来看，属于较为传统的写实风格，然而，他又表现出对各种新的艺术风格的兴趣。展出的作品中，有的画面明显带有向印象派绘画过渡的痕迹，他笔下的风景画不再只是过去完全写实的再现，而是突出光与色的印象。有几幅作品还表明他有意识地在学习日本浮世绘风格。他便是以这样一种从不停止艺术探索的精神，为现代瑞典绘画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。不过，留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他对日常生活的描写。他

的数百幅作品，为今天的人们展示出近代瑞典生活的长卷。都市景色和市井习俗、田园风光和乡村风情，洋溢着安适与温馨。这显然折射出瑞典人的传统性格。即便到了二十世纪末的今天，我感觉到，他所钟爱和再现的这些特质，依然保留在大部分瑞典人身上。这就难怪那么多瑞典人会涌进美术馆观看他的画。我想，他们欣赏他的作品，不仅仅是在回顾前辈的生活，也是在寻找着今天的影子。在现代化高度发展的时候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安适和平静的传统，尤其显得珍贵。

家庭无疑在卡尔·拉松心目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。

我所结识的瑞典人，几乎都十分注重家庭观念。对父母，对儿女，有一种朴实而真挚的感情。每逢节假日，一家人喜欢相聚一堂。这样一种家庭观念，在卡尔·拉松的画里得到生动而充分的表现。他喜爱以家庭生活为题材，几乎家里的所有成员，都是他描绘的对象。他充满温情，以一颗纯真的心，与孩子们建立

了密切的联系。他满足于生活在自己的庄园里，以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。他是他们中的一员，他的艺术与他们同在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与中国的丰子恺有异曲同工之处。丰子恺在漫画创作的旺盛时期，便常常以女儿阿宝和小伙伴们的生活作为绘画题材。家庭，儿童，对于他们这类艺术家，是生命的一部分。

1968年，瑞典出版过一套卡尔·拉松的作品。这套作品分为三册：《我们一家》、《我们的房子》、《我们的农场》，是专为儿童编辑出版的。所选作品以家庭生活、庄园生活为主要内容，孩子无疑是其中的主角。这套书的特点在于，编者从卡尔·拉松的回忆录和散文作品中，摘选出一些描述绘画过程的文字，与画作相得益彰。这些文字，平实而淡雅，生动记述下他的孩子们的天真烂漫。一位瑞典朋友告诉我，卡尔·拉松的散文，在瑞典文坛也

占据一席之地，已成为经典性作品而受到人们喜爱。在这一点上，他和丰子恺又有了一共同之处。

现在译者根据伦敦 Methuen House 的 Methuen 儿童丛书英译本（1976年初版，1989年再版）将卡尔·拉松的这些作品翻译成中文。从这些画面和文字中，我们可以略为了解到卡尔·拉松的特点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个作为画家的父亲，是如何生活于孩子们中间，从孩子们那里获得灵感，而孩子们又如何从他那里得到快乐。

因为他的画和文字，人们曾经拥有过的安逸和温馨，孩子们的天真和欢乐，将成为永远温暖人心的记忆。不仅仅对于瑞典人是如此，想必对于中国读者也是如此。

我们一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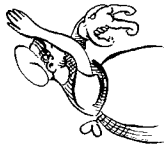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当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家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老城。那是个穷地方，在一幢被人遗弃的建筑物里，我们占了一个房间和一个厨房。房子的墙上尽是洞，蟑螂和别的什么害虫从里面成群结队地爬出来。我还记得当看到它们时，母亲便大声喊叫起来，父亲则暴跳如雷。那是瑞典最艰难的时期，贫穷而令人烦恼。

我生于1853年5月28日。我好像一点也不愿意看到贫民窟的苦难，因为母亲告诉我，只是当助产妇拍打我的屁股后，我才开始第一次呼吸，脸色由白转红，然后发出一声尖叫。等我稍微长大便被送进一所婴儿学校，然后又被送进为穷孩子们开办的免费学校。

我们家有位军人朋友，他是一个艺术家，他常带给我一些作废的铅笔头。我开始画画，那些铅笔头确定了这样一件事：我要当一个艺术家！非常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老师的鼓励，这样，在我只有十三岁的时候就被获准进入高等美术学院的预备中学学习，随后又进入了学院。

当然，我很快就感到，通向一个艺术家的路其实是很艰难的。我常常缺衣少食，但最终我从学院毕业，获得了一系列奖学金，并得以参加在法国一个艺术家的团体，那个小村庄叫格朗兹。我们景况窘迫，大家一起挣钱一起花。不过，此时我可以通过画瑞典传说和探险故事来挣钱了。





在格瑞兹的艺术家团体里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姑娘，她叫卡瑞。我们相爱了，并在1883年结婚。在格瑞兹，我们的第一个孩子——一个健壮的小小子出生了。“现在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”我当时写道，“我乐得打转，翻筋斗！”1884年的圣诞节，我看到卡瑞悠闲地坐在藤椅上，孩子在她怀里正要入睡，我决定用彩笔将她画下来。纸有些发灰，甚至上面还起了“毛”。在把这幅画的深色部分涂上颜色后，我拿起白色彩笔，在卡瑞的头发和领口上，添上从画室窗户洒进的淡淡阳光，阳光还从孩子的头上反射到卡瑞的脸颊上和下巴上。新年期间，我完成了这幅画，起名为《画室即景》。我很喜欢它，并且很快就决定为卡瑞和苏珊再画一幅。这次是油画，在同一页上你可以看到它。

苏珊九个月大时，我们搬回到瑞典，这两幅画在艺术展览中展出，从此成了我为孩子们画的一系列作品中的第一批。你可以在前面一页上看到其中的另外三幅。第一幅是我们的两个大男孩尤尔夫和庞特斯，他们身着盔甲，正在模拟士兵。尤尔夫一把剑，庞特斯扛着一面旗子，在中间一幅画里，你可以看到我和我们的第五个孩子布瑞塔，她坐在了我的头上。我把她举上来（她喜欢这样），我们正好走过一面镜子。多妙的一个对象！我不让布瑞塔下来，赶紧找来一个画架，铺开一张纸，拿起一支笔。布瑞塔觉得这太有趣了——我用了五分钟将画面速写下来。这一页的第三幅是我在1898年画的，画面上是卡瑞和我们的女儿科斯蒂。

我扯得太远了。远在后来的这些孩子出生之前，我便发现我必须挣钱。想想早年生活的艰辛和痛苦，那可怕的斯德哥尔摩贫民窟！——这使我下决心要让卡瑞和孩子们享受到幸福和安定，我应该努力在为人家和家庭画的所有作品上面，都洒上幸福和安定的阳光。



回到斯德哥尔摩之后，我们住在一套公寓里，我常常说它还不如不上一个碗柜大。我工作得十分辛苦，一边做艺术教员，一边还为报纸和书籍画插图。我的书就放在厨房，而画室则成了活泼可爱的苏珊玩的地方，也是卡瑞的工作间。一到要做饭的时候，就得腾出一个地方给她用。



1886年秋天，我们搬到了哥德堡，我在瓦兰德艺术学院担任绘画教员。这时家里的人口还算不上拥挤，另一个孩子，我的大儿子尤尔夫到1887年出生。一年后，我们又搬到了法国，庞特斯在那里出生。我当时正在为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的壁画绘制草图。这一作品直到十年后才完成。尽管对庞特斯的出生我感到高兴，可是我却抽不出时间陪他玩，也许就是这一原因，这孩子后来才变得有点儿粗率迟钝。当然，从另一角度看，这说不定还是一种不错的性格。不过，好歹我还是挤时间为新出生的庞特斯画了几张素描，并从中间挑选出一张做成版画，常常作为我们的新年贺卡。

当庞特斯大约一岁时，我从画壁面的工作摆脱出来稍稍休息一下，就为这个孩子画了这张油画《地板上的庞特斯》。我看见他坐在一块破地毯上，上面还有一个洞，这是卡瑞铺上的。他扭过头盯住我，我便赶紧画了一幅速写——像他这个年纪的孩子，手指通常会坐在那里老老实实地让你给他画肖像。然后，我支起画架，开始作画。

在此之前，卡瑞的父亲送给我们一座位于桑德邦的房子——这个只有两个房间的小木屋，盖在旧钢铁厂遗留下来的废铁渣山丘上。我们只是在夏天偶尔来住住，因为我的工作要求我大部分时间呆在斯德哥尔摩。房子实在太小，所以只要一有积蓄，我们就开始扩建。有时甚至说每生一个孩子，就为他准备一间房子！卡瑞得到了村里手艺人的热情帮助，他们是木匠、泥瓦匠、修理工、铁匠等，一起把房子改建成了一个温暖舒适的乡村别墅，而我也有了一间画室。



到1893年我们已经有了五个孩子，苏娜、尤尔夫和皮特斯之后，又新添了里斯贝和布瑞塔。布瑞塔出生在1893年，那时卡瑞和我正在瑞典西海岸的玛斯纳斯度假。我画这幅卡瑞都不乐喂奶的水彩画时，这个孩子刚刚出生两个星期。窗外阳光照在窗骨上，但是门关着的屋子光线黯淡，你们可以发现，我们在桑德邦住房里的家具和帘子，都不是用明亮清晰的水彩画的。事实上，那是我们临时租的一个渔夫的房子。

第二年，对于卡瑞和我来说一直非常忙碌。她负责处理住房事宜，监督桑德邦房子的扩建，还计划修一个花园，织毛衣毛毯，为我的模特儿设计、剪裁、制作服装。这些衣服放在桑德邦的一个衣柜里。它们属于适合在历史场景中出现的某些服装，化妆舞会上也可作为节日服装。孩子们偶尔将它们借出来穿上逗乐，或者在一些特殊场合，譬如庆祝生日的时候。我们都喜欢所有庆祝的托辞。不过，这些服装最派用场还是在画历史场景和壁画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的是画穿着日常服装的孩子们。

在画斯德哥尔摩壁画之外，我另给哥德堡的一个女子小学画了一幅《妇女历史》；我还为E·爱罗斯特纳的作品《歌与小曲》画插图，用了两年时间才完成。这些画大多数是快乐的老妇女和动物。当我看到这些画的校样时，我开玩笑地说：“既然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我的艺术作品在世界上传开，那我就不会为画画而烦恼了。”

当然，我还是不停地画画。因为，当看到孩子们时，我就不得不画了。

在《歌与小曲》完成之后，我继续进行到巴黎和威尼斯的学习旅程。再回到家里，我仍然在哥德堡的瓦兰德艺术学校任教（当然还继续画斯德哥尔摩的壁画）。我找到更多时间住在桑德邦，并这样记录了一个幸福的夏天：“日子一天天晃过，过得都一样。早上我跳进湖里，喝着麦片粥，观察我拥有的每一朵花和每一片叶子，看它们在夜里是否成长了。然后，我拿上画架，走出去找一个画的对象。”在一点半时我会回来吃饭。我画插图一直工作到五点。喝完咖啡，吃点葡萄干面包，肩上扛着画画用的东西我就又出去，卡瑞在我一旁提着晚餐的食物。我一直画到天黑得不能再画时才停下，因为在瑞典，仲夏的阳光几乎不落，实际上我们常常要等到半夜两点才回家。即便到了这时，我们还得费劲把鸡鸭赶进它们的棚子里，把门关得紧紧的，以免它们在夜里跑掉。对于一个画家，每个小时的亮光都是珍贵的，于是，在夏天，我的工作日当然也就很长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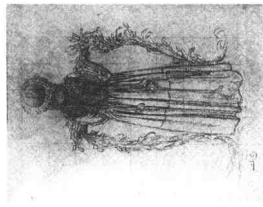


苏娜曾是我的第一幅“家庭”绘画的对象。在她大约十岁时我又给她画了一幅新的。一位艺术商人看到这幅画，甚至还要求另外再画一张相同的。哥德堡一位商人庞特斯·费森贝格也看到了它，马上要我为每个孩子画一幅肖像。但是当几乎每年都有一个孩子降生时，费森贝格就喊住暂停。他告诉我：“先生，你也许可以养得起这么多的孩子，但是我却买不起这么多的肖像。”

当然，我还是继续画孩子们。我画里斯贝穿着红长毛袜，红上衣和红围裙，手里还拿着她的红布娃娃。里斯贝像一个在阳光下欢快歌唱的歌手。无论她走到哪里，哪里就充满阳光和欢笑。

同一年，1894年，我画了这幅神情严肃正在思索的苏娜。她站在脚凳上，穿上她最好的衣服，她感到有一种自我意识。为了不让自己显得过于呆板，她把衣服打成褶。她那样子在告诉爸爸，如果不得不站在脚凳上一动不动，真是烦死了！

不过孩子们在给我当模特儿时表现得都十分出色，而且，那些来帮我们扩建桑德邦房子的工匠们也是如此。在我的壁画作品中你们可以找出木匠、装饰工，还有不少当地人，当然都穿着卡瑞精心缝制的服装。一个姑娘是国家博物馆里的那幅《古斯塔夫·瓦萨进入斯德哥尔摩》中献花姑娘的模特儿。她举着一个花冠要为国王戴上。它非常接近于体现16



世纪的服饰风格。

在1894年，按照惯例我们在桑德邦过夏天。这个夏天非常糟糕；雨不停地下了6个星期，我越来越不能外出画画。于是，卡瑞建议我不妨画画房子里面。刚开始，我就充满热情地把每个房间画上一幅，常常是每个房间里都有家庭的一个成员在里面，不过有一次只有我们的狗卡曾在里面睡觉。这些画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我的第一次大型展览中展出，五年之后又出版成一本画册《我们的房子》。



正在水边钓鱼的这个孩子是里斯贝。她动也不动，因为她希望钓到一条大梭子鱼，或者至少是一条鲈鱼，比尤尔夫和库特那天划船去钓到的还要大一些。桦木林把影子投在河面上。她注视着水面，轻轻地晃动鱼竿，希望不被她想钓到的梭子鱼发现。她全神贯注，根本没有发现我正站在她的身后为她画

画。里斯贝用一只眼睛盯着船上的男孩，我把他用深色涂上几笔加在画面上作为背景。

1897年这一年对于我们全家来说是值得记住的一年。那一年，我们的第六个孩子科斯塔诞生。同一年，我完成了在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大型壁画的工



作。这一工作终于结束——总算得到了报酬！用这笔钱，我买了一个庄园，叫做斯帕达特。当然，孩子们非常高兴拥有了一个真正的庄园。他们很快熟悉了那里一年中所有季节的工作。我有了绘画新题材的主人：挤奶时的牛，收获苹果和土豆，耕地，除草，收割——干不完的活。另外一个庄园卡特拜肯成为我父母的家。